



論人民民主專政
學習參攷材料

察哈爾日報社編印

一九四九年七月

目 錄

- 一、論人民民主專政……………(一)
- 二、關於人民民主主義的幾個問題……………(一一)
- 三、共產黨人發刊辭……………(二〇)
- 四、國家與革命……………(三〇)
- 五、論國家……………(四九)
- 六、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六五)

論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

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爲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的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爲着促使這些東西消滅而設條件，而努力奮鬥。共產黨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黨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革命的生存和發展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歡迎這一條真理，是因爲他們不願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及各國人民所推翻，對於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人，則不是什麼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造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從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爲着說清我們在下面所要說的問題，在這裏順便

提一下這個人類進步的遠景的問題。

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相國內外交內外敵人的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後，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後，中國則更落後。先進的人們，爲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鬥，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爲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後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爲什麼先生老是提問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場全國規模的運動，都

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壞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壞境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進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爲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爲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月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裡，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中，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蘇聯爲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削弱了兩個帝國主義大國，世界上只剩下了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損失。而美國的國內危機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幫助蔣介石殺戮了幾百萬中國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爲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

和國，只有工人階級能行，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覺悟過來了，有些正在換腦筋。事變之後發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歡迎這種善良的的要求重新學習的態度。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後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着就進入政治鬥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最後遺囑中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要組織黨，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同的領導階級，但不行的經驗是相同的。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蘇聯和帝國主義爭鬥的鬥爭的鬥爭上，其五我證實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孫中山死後二十四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面目。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衆。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的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的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

國主義一派的蔣介石反動派，連這也反對。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不與中國，全世界也一樣，不與國向帝國主義，就是國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中立是偽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以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他也是那樣，不刺激他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據說歐內威際的一切力量擊破海外反動派，我爲之喜。生意可做了，我們就可一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和一國建立外交關係了。

「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斯大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三個帝國主義國並建立各民主國家，也是這樣的。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的。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在國際舞台上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蘇聯、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衆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合作，那麼，誰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一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就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是太多了。孫中山臨終時講的那句必須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爲什麼呢？這是因爲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藉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殆，並不是什麼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成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爲，不能相提並論。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罷，他在那裡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着期待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綫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綫一方面去找。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

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爲什麼理由要這樣做？人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爲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保護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爲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壓迫行爲，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壓迫行爲。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响（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帶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坐班房，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爲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

民的國家才要強迫他活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團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仁政罷了，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施行的，如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這層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應消滅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達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農村的社會主義。而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國家工業化的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濟問題，這裡不來詳說。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越發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裡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只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一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爲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及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家伙學來的。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還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軍政和反革命的軍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襲來的。這個學習很緊要。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的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爲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人民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爲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証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証。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要實現經濟上的真正的獨立，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只有中國的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倚賴外國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獨立。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現在還沒有可靠的數目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現代工業不過只佔全國國民經濟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

左右。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是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具有不少人害怕民衆。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衆」，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圖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衆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層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主要的經驗。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會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歷

得慶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譬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尙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实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曾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聯共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共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聯共學習。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關於人民民主主義的幾個問題

拉科西

人民民主各國的發展與鞏固，——這是向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的初步。——使後進人民民主國家的一些基本問題，變成必須，同時又是可能的事了。作為國家形式的人民民主主義，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出現。這是一個新的現象，在規定它的性質、作用和發展方向的時候，曾經常常發生過許多錯誤和不正確的意見。根據我們偉大的導師斯大林同志的指示，這些問題的本質已經該加以澄清，現在我們看得非常明白了，時機已經來到，我們黨的廣大的群眾必須來熟悉這些問題。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保加利亞工人（共產）黨上一屆代表大會中，貝魯特同志在波蘭工人黨的代表大會中，都曾澈底地談到過它們。季米特洛夫同志說，人民民主主義各國，是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的富有全世界重要意義的勝利之果實而出現的。新民主主義各國的國家性質是被下面的事實決定的：它是絕大多數的人民、爲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勞動人民的權力，這個國家是用來反對權取者、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的武器。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是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者的一種國家，它只有堅決一貫地走上導向社會主義去的道路，才能够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最後，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是建立在和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友愛合作方面的，——它們場於以蘇聯爲首的、統一、民主、反帝的陣營。

人民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季米特洛夫又說道，由於蘇聯和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的協助，向社會主義的轉移，可以開一個不同於蘇維埃制度的人民民主主義制度的方法來達成。接着，他說道：

「人民民主主義制度……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況中……能够、並且必須順利地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機能。」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代表大會的閉會演說中，把這種思想表示得更加明確：

「根據馬克思和列寧的教義，蘇維埃政權和人民民主主義政權是同一個權力——工人階級和農鄉勞動人民聯合起來的權力的兩種形式。這兩種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

貝魯特同志也發表了同樣的意見。他說：「波蘭人民民主主義是對社會主義去的方向的馬克思列寧道路的一種變異。」他又說：

「正好像蘇聯捨身忘我的英勇協助構成了我們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基礎一樣，我們和蘇維埃道路基本不同之處，也在於從勝利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和成就裏面獲得協助和支持，因爲這原因，我們

才能導向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而變成無階級專政的各種機能。」

他又加添說：

「作爲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勞動大眾的政治權力之一種新形式的人民民主主義，只有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才能發展成爲我們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九月裡我們黨的教育會議的結論，也指示了同樣的方向。

總結起來說：人民民主主義是這樣的一種國家，在蘇聯獲得勝利之後，勞動人民靠了它的幫助，被蘇聯支持着，從資本主義一直向社會主義邁進。就其機能來說，人民民主主義是一種不同於蘇聯形式的無產階級的專政。

我們黨內的大多數人，對於理論問題都不大熟悉。他們聽見無產階級專政，就聯想到蘇聯的殘酷的內戰，或者匈牙利和蘇維埃共和國（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無產階級專政）裡面的流血的反革命叛亂，他們不清楚我們的民主國家怎樣能够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機能。他們裏面的大多數人，只迷信在蘇聯的實例裏面所看到的那樣，來想像一條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所以，我們如果用我們偉大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例子，來把專政和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的問題闡述一下，是不會有害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訓

馬克思和恩格斯告訴我們，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使被壓迫階級屈服的一種機構。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於是這樣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解釋的。恩格斯也曾這樣重複地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說過，那時他們抱着一種見解，認爲國家只是在一個君主國，一個帝國或一個王國中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民主共和國裏情形就不然。恩格斯告訴他們：

「國家只不過是「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一種機關」，的確，就是在民主共和國裏，也和君主國家裡一樣。」（恩格斯「論法蘭西內戰」的序文。）

這個問題，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之後，具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甚至在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之後，尤其是如此。考茨基領頭的一批社會主義的叛徒，否認民主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壓迫機關，勞動人民如果要獲得解放，就非推翻它不可。正是爲了反對這些人，甚至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前，列寧就寫了他的那本「國家與革命」，他在那裏而又一次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問題的一些意見挖掘出來，這是被那些一變而成爲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們所故意埋葬的。列寧在上述這本書裡寫道：

「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在基本上，總是一個樣子：無論怎樣，最後分析起來，這一切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集」第七卷第三十四頁）

列寧特別強調這一點：勞動人民必須認識清楚，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帶着專政的性質。舉例說，在一九一九年，奧匈斯維德洛夫大專的學生發表有關國家問題的演說時說：

「只要私有財產存在一天，你的國家，即使它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它也不過是資本家用來壓迫工人的機關而已，國家越自由，這一點也就表現得越是明顯。這例子，就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美國，沒有一個地方，資本會統治得像在這些國家那樣令人啼笑皆非和荒唐無稽……雖然它們都是民主共和國。」（列寧「選集」第十一卷第六五頁）

列寧更詳盡的告訴我們：這些國家的工人一發動改善他們境遇，立刻就會動員軍隊起來，以致發生內戰。

轉移的形式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這是非常明白的，即使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必然就是一種反對勞動人民的專政。但是，當民主共和國的領導權落在勞動人民手中的時候，情形又如何呢？在勞動人民領導下的民主共和國，難道也是一種專政嗎？關於這，只有一個回答：它無疑地是一種專政。在大約二十五年以前，斯大林同志說過：

「國家是抓在統治階級的手裏，用來撲滅其階級敵人的的一種機關。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同志加的重點）無產階級專政在基本上，和任何別的階級的專政毫無不同之點，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是用來鎮壓資產階級的一種機關。但是，這裡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在於：一切迄今為止所存在着的階級國家，都是榨取的少數人對被榨取的多數人的專政，無產階級的專政，則是被榨取的多數人對榨取的少數人的專政。」（斯大林「列寧主義的基礎」第四章）

在談到資產階級國家形式的種類的時候，列寧加添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去的轉移，一定會造成多種多樣的無數政治形式，但它在基本上，不可避地只能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重點是我加的）「拉科西」（列寧「國家與革命」：「選集」第七卷第三十四頁）

問題非常明白：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去的轉移是多種多樣的，一種形式可能是蘇維埃的形式，另一種可能是人民民主主義。當蘇聯出現的時候，曾經發生過這個問題，當時雷什維克和改良主義派社會民主黨人否認蘇維埃共和國的本質和巴黎公社是一致的。他們指出：巴黎公社的形式是一種民主共和國，連同它的一切屬性，諸如公民普選等等。這是很明白的事，巴黎公社的民主共和國很像人民

民主主義各國，但還沒有變更它的專政的性質。於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擬定了列寧和斯大林在蘇維埃革命中加以應用並發揚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那些特性**。

當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出現的時候，它在許多方面也很像一個民主共和國；它不是在武裝革命中成立起來，它保留着公民普選等等。由於這種原故，列寧早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就喚醒我們注意如下的事實：

「毫無疑義，處於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條件之下，如果僅僅毫無準備地模倣我們的策略，這將是一個錯誤。」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爲什麼能够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來建設社會主義呢？

蘇聯的作祟

對這問題的答覆，那就是蘇聯的誕生。蘇聯是在國內革命力量的影響之下，沒有獲得國外的援助而出現的。這是世界上這一類型的國家的第一個，俄國資產階級都不相信它的前途。相反的，他們認爲，它有維持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們堅持着，發動叛亂。企圖打到流盡最後一滴血，再利用外僑來恢復他們失去的權力，經營英勇自衛的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

列寧關於這一點寫道：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移，標誌着一個整個的歷史時期。一直到這個時期結束時爲止，權取者們將必須抱着再起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將轉變爲再起的嘗試。在他們遭受到第一次慘敗之後，被推翻了的權取者們！——他們沒有料到會被推翻，從來不相信這是可能的，也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一點。——爲代表者他們那些一直過着這樣一種甜美而安適的生活，可是現在「普通群眾」已使他們處於

毀滅和貧窮（或者說，使他們去做「普通」工作的家庭，用千百倍的力量，如焚的熱情和憎恨，投身到爭取恢復他們的失去的「天堂」的戰鬥中去。）（列寧「無產階級革命」：「選集」第七卷第二四〇頁）

同時，列寧在致匈牙利工人的賀電中說道：

「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不僅僅是暴力，而且首先第一並不是暴力。」

他在致高爾基的幾封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這個問題，認為蘇聯恐怖的程度，是由於反革命的瘋狂浴血的進攻所造成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機能

如果我們可以用小來比大的話，那麼，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初幾個月，也沒有槍斃過一個人，安然地渡過的。只有當帝國主義者從四面八方來進攻我們，他們的內應也武裝起來的時候，局勢才有些改變。當一九三五年匈牙利反動派的法院叫我去說明公社的事蹟的時候，我可以有一種不是辯護，而是選擇的態度說，「恐怖對於我們不是一種遊戲，不是一種目的，而是敵人驅迫我們如此做的一種必要。」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蘇聯解放軍不僅僅擊潰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而且，作為其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的副產物，希特勒屬國的國家機構，或者說，德國納粹黨人在佔領時期中所設立的國家組織，也都分崩瓦解了。這個國家機構，到處多多少少地曾經獲得過階級的支持，納粹的慘敗，加速了它們的滅亡。留在蘇聯和柯爾察克、但尼金以及別的反革命份子的軍隊一起打了三年仗的那些地主、資本家、憲兵、軍官和國家的高級官員們，隨同希特勒匪徒們逃到西方去了。那些留下來的人，無法阻止勞動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來攫奪政權。由於蘇聯軍隊的存在，他

們立刻想到，再沒有機會來發動像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在蘇維埃所發生那種公開的武裝叛亂了，因此，他們就不在作這樣的嘗試。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越變得堅強起來，殘餘的資產階級要藉國內的力量來作這樣的企圖，也就越是沒有希望了。

這種情形，使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能够不靠流血的內戰，不靠採取蘇維埃形式無產階級的專政，比較和平的來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機能。什麼是這些機能呢？斯大林同志認為有三項重大的任務：

「（一）擊破已被革命所推翻並沒收其財產的那些地主和資本家們的抵抗，消滅他們恢復資本的權力的每一個企圖；

（二）這樣地來發動建設工作，以便把全體勞動人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進行這種工作，以便準備取消廢除階級；

（三）把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的軍隊，來反對國外敵人，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斯大林「列寧主義的基礎」第四章）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越是力量雄厚，它們也就越是能够完成這些任務。這是互為因果的，所以越能够完成這些任務，它們也就越要變得強盛起來。

匈牙利局勢

匈牙利是人民民主主義各國中最年輕的一個。就基本上說來，這是由於匈牙利最後成爲希特勒的衛星國的那個原因，但是同時也因爲在解放之後的一個長時期中，我們太低估計了敵人的力量。在過去，經過了二年半堅苦卓絕的工作，共產黨才能够獲得不但是產業工人的，而且也是大多數勞動農民、進步知識分子和小商人的支持。

在我們經過三年堅苦卓絕的工作，終於使勞動人民相信了我們理想的正確性之前，在我們揭破了舊有資產階級的秩序捲土重來的陰謀之前，問題一直沒有獲得決定：國家是否要走工人民主主義的路，抑或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路。僅僅依靠蘇聯人民的援助，還是非常不夠的。正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場合，共產黨必須不僅被產業工人階級，而且也被它的盟友，勞動人民，小手藝人，小店員以及進步知識分子一致認為是他們的領導人。我們會這樣說過，蘇聯從我們手上除去了鐮銼，但是她不能代替我們來建設民主主義，我們必須自己來做這件事。

在我們贏得絕對大多數勞動人民之前，在我們國家裡也曾有過一種「二重權力」，正像一九一七年在克倫斯基的時代一樣：一種是死戀着資本主義的舊勢力，還有一種是走向社會主義新勢力，它們並立在一起，交錯着，互相搏鬥着。鬥爭的前途是絕對有利於社會主義，有利於人民民主主義的，但是我們還須要許多年的艱苦工作，蘇聯和人民民主主義各國的支援和互相幫助，然後才能够鞏固我們業已獲得的成果。

人民民主主義各國是由於蘇聯的協助和支援而成立起來的；他們藉互相幫助，增加了力量。只有依賴着蘇聯，各國間才依爲命，他們才能够繼續生存下去，在豺獍可怕、劍聲霍霍的帝國主義前面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任何一國，如果離開了這個大家族，它立刻就不再是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了，必然會回到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陣營裏面去。南斯拉夫領袖們六個月變節的歷史，就十足証明了這一點。

階級力量的新均勢

我們匈牙利共產黨人，沒有整個兒把我們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性質、任務和發展的問題提出來過。這種缺憾，一部分是因爲我們人民民主主義發展較漏的原故，這不可避免地誘致了關於若干問題的

錯誤意見。從一開始的時候起，我們一直就駁斥着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是否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但是，若干同志在提出我們的問題的時候，一方面着重指出相同之點，同時對於蘇維埃形式的專政的不同之點，却過分加以強調了。

最後，我們必須注意到另一種見解：人民民主主義各國，乃是在蘇聯獲勝和法西斯主義潰敗之後所發生的新的國際階級力量平衡之結果。貝魯特同志喚起我們注意下面一點：

「人民民主主義是在我們時代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建立的革命權力的一種特殊形式，這是新的國際階級力量平衡的表現。」

自從戰爭結束之後，這種階級力量的平衡越趨趨向於社會主義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中國勞動人民的逼近勝利，希臘共產黨人的成功，勞動人民的堅決支持意大利和法國共產黨，在在都証明了這一點。這些也是建設社會主義世界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獲得力量的來源，這種國際主義的勝利耗費了這樣很多的血汗，促其實現，乃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任務。我們得注意，必須用成功和光榮來完成這個任務，爲了匈牙利勞動人民的福利和繁榮的原故。（谷風譯自匈牙利共產黨的機關日報「斯在巴德·納普報」）

（轉載上海「時代」雜誌第九卷第十九期）

「共產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爲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

的時候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山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另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而黨的任務是動員群眾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為「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將寫些什麼東西呢？它和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呢？

它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我們現在也正在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創作之中。爲了這件事，不是一般黨報所能勝任的，必須有專門的黨報，這就是「共產黨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來，我們的黨已經是全國性的黨，也已經是一個群眾性的黨；而且就其領導骨幹說來，就其黨員的某些成份說來，就其總路綫說來，就其革命工作說來，也已經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與布爾塞維克的黨。

那末，還有什麼新的任務呢？現在提出新的任務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們現在有大批的新黨員，很多的新組織，對於他們，還不能說是廣大群眾性的，還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還不是布爾塞維克化的。同時，對於老黨員，老組織，也發生了提高水平的問題，發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一步鞏固與進一步布爾塞維克化的問題。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內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複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巨得多了。

現在是民族統一戰綫的時期，我們同資產階級建立了統一戰綫；現在是抗日戰爭的時期，我們黨的武裝在前綫上配合友軍同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現在是我們黨發展成爲全國黨的時期，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如果把這些情況聯繫起來看，就懂得我們提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一個光榮而又嚴重的任務了。

我們現在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樣進行呢？我們現在一定要建設這樣一個黨，究竟應該怎麼辦？能達到目的呢？解決這個問題，是同我們黨的歷史，是同我們黨的十八年鬥爭史，不能分離的。

我們黨的歷史，從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黨經歷了許多偉大的鬥爭。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這些偉大鬥爭中，鍛鍊了自己。它們經歷過偉大的革命勝利，也經歷過嚴重的革命失敗。經歷過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又經歷過這種統一戰綫遭受到分裂，並同資產階級及其同盟者進行嚴重的武裝鬥爭。最近三年，則又處於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時期中。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是在這樣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係中走過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過程中的特點，而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所沒有的。再則，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像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說得

非常之難的。這一時期，這三項新提出的中間的特點，也是各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所沒有或不同的。這些：（一）資產階級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統一戰綫；（二）革命形式主要的是武裝鬥爭；（三）建立了中國資產階級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兩個基本特點。這裏我們沒有把黨同農民階級與黨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作為基本特點，這是因為：第一，這種關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原則上都是一樣的；第二，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鬥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係即是黨同農民的關係。

由於這兩個基本特點，恰是由於這些基本特點，使我們黨的建設過程，我們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也在特殊的情況中。它的失敗與勝利，它的後退與前進，它的縮小與擴大，它的發展與鞏固，都不能不聯繫於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與黨同武裝鬥爭的關係。當我們黨的政治路綫是正確的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或被迫若分裂統一戰綫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步；而如果是錯誤的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步，同樣，當我們黨正確的處理革命武裝鬥爭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步；而如果是錯誤的處理這個問題時，那末，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也就會要後退一步。十八年來，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綫密切聯繫着，是這樣同黨對於統一戰綫問題、武裝鬥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正確處理密切聯繫着。這一論斷，很明顯的，已經被十八年黨的歷史所證明了。倒轉來說，黨愈益趨於布爾塞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愈益正確的處理黨的政治路綫，愈益正確的處理關於統一戰綫問題與武裝鬥爭問題。這一論斷，也是很明顯的被十八年來的黨的歷史所證明了。

所以，統一戰綫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的理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就等於正確的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在十八年來的

歷史中，憑藉我們豐富的經驗，失敗與成功，後退與前進，縮小與發展的深刻的與豐富的經驗，我們已經能夠做出正確的結論來了。就是說，我們已經能夠正確的處理統一戰線問題，又正確的處理武裝鬥爭問題，又正確的處理黨的建設問題。也就是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在這裏，讓我們對於這三個法寶，三個問題，分別的大略的說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國無產階級同中國資產階級及其它階級的統一戰線，是在三種不同的情況、三個不同的階段中間發展着的，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階段，十年內戰的階段與今天抗日戰爭的階段。三個階段中，證明了下列的規律：（一）由於中國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軍閥的鬥爭的。因此，無產階級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應該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盡可能的保持之。（二）又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它就會動搖變節。因此，中國革命統一戰線的內容不能始終一致，而是要發生變化的。在某一時期有資產階級參加在內，而在另一時期則資產階級並不參加在內。（三）由於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就是在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參加統一戰線並和無產階級一道向共同敵人進行鬥爭的時候，它們也把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發展，看做是不利於它們，而要加以限制，而要採取欺騙、誘惑、消解與打擊等等破壞政策，並即拿這個政策作爲它們拉攏敵人與分裂統一戰線的準備的。（四）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五）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者。這些規律，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與在十年內戰時期証明了，而且在三年的抗戰中也在証明着。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在同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組織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必須實行堅決的、嚴肅的兩條路線鬥爭。一方面，反對對於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

定程度的革命可能性的忽視，把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樣，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並儘可能保持這統一戰線的政策，這都是左傾關門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反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以及革命的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等看做一樣的東西，忽視它們之間的原理的差別；忽視資產階級不但在極力影響小資產階級與農民，而且還在極力影響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力求消滅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而把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思想歸於資產階級的一群一黨；而一到革命對於它們一群一黨的私利相衝突時，它們就實行叛變革命。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方面，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過去陳獨秀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群一黨的私利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體原因。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二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與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資產階級聯合又同它鬥爭的中間發展與鍛鍊出來的。這裡所謂聯合，就是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就是在聯合時，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着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所有這些都是在過去十八年的歷史中証明了的。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它的歷史，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參加資產階級的北伐戰爭。這時，我們黨雖已開始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但還沒有

澈底了解其重要性，還沒有了解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第二階段，是十年內戰。我們黨已經建立了獨立的武裝隊伍，已經學會了獨立的戰爭藝術，已經建立了人民政權的根據地，並且已經能够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與其他許多的必要的鬥爭形式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起來，就是說，同工人的鬥爭，同農民的鬥爭（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婦女的、一切人民的鬥爭，同政權的鬥爭，同經濟戰綫上的鬥爭，同奸賊綫上的鬥爭……等等鬥爭形式，都在全國範圍內或者直接的或者間接的配合起來。而這種武裝鬥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武裝鬥爭史的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够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够運用武裝鬥爭形式與其他各種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鬥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十八年來，我們黨的政治路綫與黨的建設，是密切聯系於這一鬥爭形式的。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綫，也就不能了解我們的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綫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十八年來，我們黨是日趨學會了並堅持了武裝鬥爭這個路綫。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十八年來，我們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是在革命戰爭中進行的，是與游擊戰爭不能分離的，沒有武裝鬥爭，沒有游擊戰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這個拿血換來的經驗，全黨同志都不要忘記。

黨的建設的過程，黨的發展、鞏固與布爾塞維克化的過程，也同樣是有三個階段的特點的。第一階段是幼年的黨。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與中間，黨的路綫是正確的，黨員羣衆與黨的幹部的革命積極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獲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勝利。然而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綫、武

裝鬥爭與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都不懂得或不豐富的黨，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的革命的實踐之間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因此，黨的領導機關中佔統治地位的成分，在這一階段的末期，在這一階段的緊要關頭中，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鞏固革命的勝利，接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受了失敗。在這一階段中，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鞏固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與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的總結起來。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技術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敵人與同盟者都在陰謀暗害我們的黨，但是沒有警覺性。黨內湧出了很多的活動分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幹。黨的手裡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於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而來的，這就是黨的建設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即十年內戰的階段。由於有了第一階段的經驗，由於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的進一步的了解，由於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有了進一步的聯系，就使得我們黨能夠進行了勝利的十年蘇維埃鬥爭。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了，但是黨能夠緊緊地依靠着農民。黨的組織不但重新發展了，而且得到了鞏固。敵人雖然天天在暗害我們的黨，但是黨驅逐了暗害分子，黨內不但重新湧出了大批的幹部，而且使這些幹部變成了黨的中心骨幹。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所有這些，都是黨的重大進步與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黨員是在這個偉大門爭中跌下了或跌下過機會主義的泥坑，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於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太缺乏，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間，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因此，就使黨的

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沒有能够在這一整個階段的一切時間中都完全的掌握住正確的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黨與革命在一個時間中是遭受過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而在另一個時間中，又遭受過革命戰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與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的危害。然而這一切，是在黨的四中全會與黨的遵義會議這兩次歷史的會議中所先後戰勝了。及至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遵義開會）以後，黨就消底的走上了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奠定了後來戰勝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礎。這就是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黨的發展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階段。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三年，這三年的鬥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黨憑着過去兩個革命階段中的經驗，憑着黨的組織力量與武裝力量，憑着黨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很高的政治信仰，憑着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更加深入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且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的大黨。黨的武裝力量，也在抗日戰爭的鬥爭中重新壯大起來與進一步堅強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更加擴大了。這些都是偉大的功績。然而，黨是發展了，但有大批的新黨員與很多的新組織並沒有鞏固，他們同老黨員與老組織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區別。他們還沒有很多的革命經驗。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國的歷史知識與社會知識，還不懂得或不豐富。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理解，還相距很遠。在過去發展黨的組織中間，雖然中央着重提出了一大大發展黨，但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分子與敵人的暗害分子在內。統一戰綫雖然建立了並堅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却時時刻刻在企圖破壞我們的黨，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所指揮的嚴重的磨擦鬥爭在全國進行着，反共之聲遍於各地，大資產階級投降派與頑固派並加以此作爲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統一戰綫和共了中國向後倒退的準備。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企圖消解共產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產

黨，取消邊區，取消黨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任務，無疑是克服這種投降、分裂與倒退的危險，盡可能的保持民族統一戰綫，保持國共合作，而爭取繼續抗日、繼續團結與繼續進步；同時，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意外的損失。爲達此目的，就要鞏固黨的組織，鞏固黨的武裝力量，並動員全國人民，進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堅決的鬥爭。這種任務的完成，依靠全黨的努力，依靠全體黨員、黨的幹部、黨的各地各級組織，實行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鬥爭。而我們相信，在有了十八年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在它的有經驗的老黨員、老幹部和帶着新鮮血液富有朝氣的新黨員、新幹部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經歷過風浪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央與地方組織相互協力之下。在它的堅強的武裝力量與進步的人民群眾相互協力之下，這些目的是可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們黨在十八個年頭與三個階段中的主要的經歷與主要的問題。

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綫與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綫，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綫，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綫與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係。

我們今天要怎樣建設我們的黨，要怎樣才能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把黨的建設問題同統一戰綫問題、同武裝鬥爭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把黨的建設問題同聯合資產階級又和它作鬥爭的問題、同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日游擊戰爭與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問題聯系起來看一下，就會懂得。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與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全黨，使黨鐵一樣的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摘錄)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三)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對本問題的提法

一八五二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德意志麥斯爾的信摘要登載於當時《魯德志》第二十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在這封信裡有如下一些精彩的論論：

「至於講到我呢，那末無論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彼此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早已敘述過階級鬥爭。歷史發展，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早已敘述過各個階級經濟演進。我所作出的新東西就在於證明下列幾點：(一)階級存在不僅僅是與軍事發展適應而固有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 (historische Entwickelung) 的產物；(二)階級鬥爭必然要引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在這一段話裡，馬克思極鮮明地說明了兩點：第一，是他的學說與資產階級最深刻的先進思想家所學說之間的主要根本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着，這樣寫着。但這是不正常的。而根據這個不正常的見解，往往就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機會主義的曲解，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資產階級所可受

的更爲「純粹」的鬥爭學說不上。由馬克思所提出的資產階級與馬克思以前所製造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誰懂得承認階級鬥爭，那也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是有離開資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承認階級鬥爭，便是要認馬克思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爲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階級鬥爭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此。又如用這塊黃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那也應和承認。無怪乎當我們發展現在實踐上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的時分，不僅一句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而且還有「改良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之間的人們），那也應和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那也應和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戰爭的這本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出版的，他這本小冊子是英市新亞細亞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則專部地否認它的一個日本例子（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改良主義，一九一八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出版）。

以過去論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爲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它完全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所討論的資產階級專政下，因爲這個機會主義也是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領域內。（而這個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範圍內，無論哪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者不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就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從無產者和一般窮人變化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爲反對資產階級而獨行的專政）國家。

其次，必須瞭解，一個階級專政不僅爲一般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那個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階級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代所必需，——只有瞭解了這一點的人才算是領會了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底實質。各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却是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

第五章 國家消亡底經濟基礎

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即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布拉克的信，直到一八七九年才刊發於新時代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中，已有俄譯單行本），對於這個問題有最爲詳盡的說明。在這「精彩著作中批評薩繆爾主義的辯論的部分，可以說是遮掩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對於共產主義發展與國家消亡的聯繫的考證。

（一）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若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布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於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致伯爾的信作一膚淺的比較，也許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得多的「國家主義」的色彩，也許覺得這兩位作家對於國家的見解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勸伯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從綱領中完全驅除國家一語，而代之以「公社」一語；恩格斯甚至宣佈說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馬克思則甚至講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制度」，就是說，彷彿他認爲甚至在共產主義下也要有國家。

但這樣的觀點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對於國家及其消亡問題的見解完全相符合，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而言。

至於確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點當然無從說起，尤其是因為它顯然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間的表面上的差異，是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以及他們所抱定的目的彼此不同。恩格斯底目的，是要很明顯地，激烈地，扼要地向伯伯爾指明國家問題上所流行的（拉薩爾也是幾乎贊同的）那些偏見之全部荒謬性。馬克思却只是在論述另一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善，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問題，並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

究竟根據什麼實際材料可以提出將來共產主義底將來發展問題呢？

這裡所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個社會力量動作底結果。馬克思從來沒有企圖創造一個托邦和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他提出共產主義問題，也是像例如一個自然科學家提出某種新的生物變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這個變態如何產生出來以及按照怎樣一種方向變化着。

馬克思首先就掃除了哥達綱領所滲透到國家與社會相互關係問題中去的那些糊塗觀念。

……「現代的社會，——他寫道，——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多少免除了中世紀雜質，依每一國度歷史發展底特點而形態多少有所不同，多少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也是依每一國度而變更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完全不同。它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爲要達到自己的解放，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這個問題的提法已經有些不同了：從向着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底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看見，共產黨宣言是把兩個概念簡單並列起來：「變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和「奪得民主制」。根據上述一切，便可以更確切地斷定民主制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究竟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這個社會最順利發展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便是民主共和國。但是，這個民主制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範圍的限制，因此它實際上始終只是極少數人，只是供有產階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自由，始終是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裡的自由大不相同；只是供奴隸主享受的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條件，始終是被貧苦階級壓榨得「無暇問民主」，「無暇問政治」，以致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範圍之外的。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正確的一個最好不過的例子，因爲在魏瑪國家裡，由憲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支持得特別長久和穩固，幾乎有半世紀之久（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緊此時期在「利用合法性」並使工人參加政黨組織的人數百分比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這點上所作的要比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所作的多得多。

試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算是最高尚的這種政治感覺積極的僱傭奴隸人數百分比，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數目呢？在一千五百萬僱傭工人中間，只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在一千五百萬人中間，只

有三百萬是工會會員！

供極少數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民主制。如果仔細考察資本主義民主制底結構，那末我們無論在選舉法底「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條文上（居住的年限，婦女除外等等），或在代議機關底辦事手續上，或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會場不供「窮人」享用！），或在日報純粹按資本主義原則組織起來以及其他種種事實上；到處都可看見民主制所受到的重重限制。專門用來對付窮人的這種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等等，看來似乎是很細微的，——尤其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感到過貧乏，從來沒有同被壓迫階級大眾生活接近過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若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來，是很細微的，——但是這種種種限制總合起來，却把窮人排斥和摒出於政治生活以外，不讓他們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絕妙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底這種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經驗的時候說道：容許被壓迫者數年一次來解決壓迫階級中什麼人應在國會裏充當他們的代表者和鎮壓者！

但是脫離這個資本主義民主制，脫離這個必然是範圍狹窄的，暗中排斥窮人的，亦即完全虛偽和騙人的民主制而向前發展的過程，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不穩朝着「日益澈底的民主制」進行的。絕對不是。向前發展，即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決不能經過別的道路，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底反抗，是無他人可作，別無他路可走的。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為統治階級以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以擴大民主制為限。除了把民主制大規模地擴大成為第一次供貧民享受的民主制，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而不是供富人享受民主制而外，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而外，無產階級專政還會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實行

許多列強自由的手段。假使使人類從個體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我們就必須壓倒這種人，必須用強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有領壓有強力的地方，當然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記得，恩格斯在他致伯爾的信中很慘爛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鎮壓敵人，而一到有可能來談自由時，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使絕大多數民衆享有民主，而以強力鎮壓那些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分子，即是把個體壓倒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縱容民主進和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內的那種民主制。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底反抗已被徹底粉碎時，當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時，當階級已不復存在時（即當社會中各成員在其對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什麼差別時），只有那時，「國家才會消逝，才可以講到自由」。只有那時，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那時，民主制才會開始消亡，其原由很簡單，就是人們既然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卑鄙現象，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數百年來人所熟知，數千年來一切處事爲言上所重複說明的和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願遵守這些規則，而不需要什麼強制，不需要什麼壓迫，不需要什麼叫作國家的特別強迫機關。

「國家消亡」一語，真是選得非常中肯，因爲它既能表明過程底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底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够而且無疑會發生這樣一種作用，因爲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一種令人憎恨，引起挑誘和起義，使鎮壓成爲必要的東西，則人們是容易習慣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的。

總之：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看見的民主制，是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享受，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制。無產階級專政，即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第一次給予供人民享受，供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給予真正完全

的民主制，而民主制越完全，那它也就會越迅速地成爲不需要的東西，而自行消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着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由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而且是由少數人鎮壓多數人的特別機器。很明顯的，爲要使剝削者少數來一貫鎮壓被剝削者多數的這種一種事情獲得成效，就必須採取極其惡極殘酷的鎮壓手段，就必須造成無數流血慘痛，而這種流血慘痛是人類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僱傭勞動制度下所確實經歷着的。

其次，在由資本主義已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大多數加於少數，被剝削者加於剝削者的鎮壓。特別的鎮壓機關，特別的鎮壓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的國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爲由昨天還是僱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乃是一件比較容易，簡單而自然得多的事情，因而其中所流的血將比從前爲了鎮壓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起時所流的血要少得多，人類爲此所耗費的代價便宜得多。而且這種鎮壓與把民主制普及於絕大多數居民的事是並行不背的，真是對於特別鎮壓機器所需要性將開始消逝。自然，剝削者若沒有想複雜的鎮壓機器便不能鎮壓人民，但是人民爲了鎮壓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幾乎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別機關，而只要有武裝群眾底組織（如像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且先在這裡指出一下）就夠了。

以後，只有共產主義才造成完全不需要國家的條件，因爲那時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了。這是一點也不含糊的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一點也不否認剝削人過火行動的可能與必不可免，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件事消，却用不着什麼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這件事將由武裝人民自己來做，而且做起來是如此簡單容易，好像甚至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和解打架的人或備止虐待婦女的事那樣。第二，我們知道，這普公共生活現時的過火行動之所由發給的根柢社會原因，乃是群

變被剝削，就是由於他受貧困，而消亡的主要原因一消除，則過火行動就必然會開始「消亡」。其速率和激進程度如何，當然雖然不同，但這種過火行動必然歸於消亡，却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火行動一消亡，則國家也會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將來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沒有去涉及幻想，而是把現時所能確定的東西加以再詳細的確定，即確定了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

(三)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很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認為工人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明，在共產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去一部分作為後備基金，又扣去一部分用以擴大生產的基金，又扣去一部分來補償「用壞了的」機器等等，而這些消費品又須取出一筆作為管理經費，作為學校、醫院、對軍隊等等經費的基金。

馬克思是不停地說明那類「一些含糊不清的籠統語言」在全部勞動產品歸工人，而對勞動者應得社會財不得不怎樣經營的題目作出很濶闊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分析到已沒有資本主義階級的成員能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裏」（在分析工人底勞動時）「所謂的小資產者自身共濟了的需要，共產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底生產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各方面，財產、道德和智識方面，當然會替換出脫離目的的需要，這就使國家的消亡更速了。」

這句附帶的論述不單說明階級中那些階級在各方面都趨於消滅，而救濟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低級階級。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而是歸全社會所有了。每個社會成員都担負某一部分社

會必需工作，都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個證明他做了若干工作的證書。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從公共消費品貯藏所中領取相當數量的產品。於是，除去劃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而外，每個工人就從社會方面領得相當於他所貢獻於社會的份量。

這樣，似乎「平等」已經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即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稱之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制度）形容為「公平的分配」，形容為「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權利」時，那末，拉薩爾是錯誤的，而馬克思就來解釋他的這個錯誤。

「我們看見，——馬克思說，——在這裡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這還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它也如何法權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法權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於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們，因而「平等權利」就是違背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一個人要作出與別人相等的一份社會勞動，他就領得一份同等的社會產品（除上述種種扣除而外）。

然而各個人是不相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是結了婚的，有的是沒有結婚的，有的兒女多些，有的兒女少些，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在同等的勞動下，——馬克思做出結論說，——資本即在同等享受社會消費品存額的條件下，某一個人實際上所領得的比另一個人多些，某一個人就會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為要避過這一切，權利就不應當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還不會有什麼公平與平等；富是程度的差別依然存在，而且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那時已無法把生產資料——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據為私有。馬克思批評拉薩爾所說「一切平等」與「公平」的小資產階級糊塗句時，是指明了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將迫不得已而初期僅僅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

「公平」現象，却不能一下子就消滅。『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的那種尚屬存在的「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學家，連資產階級的教授在內，連我們的「若干」在內，常常證實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們中間的不平等，說他們「夢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看見，這樣的證實僅僅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毫無知識而已。

馬克思不僅極其確切地估量到人們中間不可避免的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為全社會公有（普通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不平等，這個法權還繼續統治着，因為產品是「按工作」來分配的。

：「但是這些缺點，——馬克思又繼續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中，在它經過長久的產育苦痛以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裏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權不能超越社會經濟結構及由此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程度。」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普通稱為社會主義的階段）中，「資產階級式的法權」還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只是在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即只是在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某些個人底私有財產。社會主義將其變為公共財產。在這個限度內，——且只有在這個限度內，——「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是不復存在的了。

但是，它在其另一部分中却依然存在，它依然是社會各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勞動領得等量產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沒有消除認許不相等人們按不等量的（事實上不等的）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那種資產階級式的法權。

這是一個「缺點」，——馬克思說，——但這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若不陷於空想主義，就不能以為一推翻資本主義以後，人們立刻就可學會替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法權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廢除並不能立刻造成這種變更更底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外，便沒有其他的標準。而在這個限度內，就還需要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底平等和產品分配底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下去，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認許事實上不平等現象的「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爲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要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四) 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著又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當那奴役人剝迫使被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後；當體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已隨之消失後；當勞動已經不單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爲樂生的第一要素時；當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財富都儘量湧現出來時，——只有那時，才可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殘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會就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完全認識，恩格斯在無情譏笑那種把「自由」與「國家」兩名詞連接起來的荒謬見解時，是怎樣想的。當國家還存在時，便沒有自由。當有了自由時，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底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發展，那時體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

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根源之一已經消失，而這個根源僅靠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僅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剷除的。

這種剝奪就會造成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可能。我們既看見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如何不可思議地阻滯着這種發展，而在現今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上又可以把這種發展推進得多麼迅速，於是我們就能有十二分把握地說，對於資本家的剝奪，一定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將如何迅速前進，它將如何迅速達到打破分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以及將勞動變為「樂生」的第一要素——這是我們所不知道，並且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也就只可以說到國家底必然消亡，着重指出這個過程底長期性，以及這個過程依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發展速度為轉移，而把消亡底日期或消亡底具體形式問題保留，作為完全沒有解決的問題，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種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時，就是說，當人們已如此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底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如此發展，致使他們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時，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底狹隘眼界」，這迫使人們像施洛克那那樣吝嗇地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也不要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就會被打破。那時，產品底分配就會不必要由社會來規定各人領取產品的數量；那時，各人都會「按其所需」來自由領取了。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當然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叫作「純粹的烏托邦」，並胡說八道，彷彿社會主義者約許每個人有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煙、汽車、鋼琴等等的權利，而對個別公民底勞動不加以任何的監督。即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是用這種無理謔嘲來敷衍了事，但他們只是以此暴露他們的愚昧無知，以及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而已。

其所以說是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曾想約要「約許」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

來，而偉大社會主義者在預察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推想的前提既不是現今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存的唐人，因為這種唐人猶如波米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一樣，是置於「無故」損壞社會財富的積貯並提出不可執行的要求的。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尚未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以實行剝奪資本家，以及由工人監督資本家來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僚底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底國家來施行的。

資產階級思想家（以及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的辯護，就在他們用一些關於遙遠將來的爭論與空談來替換目前政治上的緊急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加」即整個國家中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加底全部工作完全服於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唐人，以及附和他的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先生們說「什麼的烏托邦，說什麼布爾什維克蠱惑人心的許約，說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話的時候，他們正是指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而言。但共產主義底高級階段是誰也不僅沒有許約，而且連想也沒有起來『施行』的，因為它根本是不可『施行』的。

於是我們也就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問題了。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所引過的他那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這一名稱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說到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間的區別，在政治上說來，將來有個時候大概會是很大的，但現時，在資本主義下，注重這個區別，便是很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區別提到第一位，那就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才能這樣做吧（如果在克魯泡特金輩、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明星」們「播弄列諾諾夫那樣」辯護社會主義沙文主義者，或如一個尚保有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柯所說那樣變

成無政府黨隊員以後，而在無政府主義者還有人絲毫沒有學會一點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有區別，却是很明顯的。通常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爲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二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變爲公共財產，那末『共產主義』一語在此處也是可以應用的，如果不忘記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話。馬克思這些解釋底偉大意義，就是他在這裡也一貫地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証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並沒有煩瑣地臆造和『虛構』種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於毫無意思的字面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爲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各個階段。

在其第一階段上，共產主義還不能是在經濟上已經完全成熟的，還不能是已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底傳統或痕跡的。由此就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上仍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與其疆界』。自然在消費品底分配方面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於是當然也就要有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爲若沒有一個能夠強迫人們遵守法權標準的機關，則所謂法權便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以內不僅會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着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哩！

雖然看來，這好像是強詞奪理，或不過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証把戲，而那些沒有花費過絲毫功夫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常深刻內容的人們，也就是時常這樣來責備馬克思主義的。

其實，新事物中間留下有舊事物殘餘的情形，我們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實際生活中都是隨時隨地可以看見的。馬克思也並不是任意把『資產階級式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指出一種剛剛從資本主義胞胎中產生出來的社會裡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巨大意義的。但民主制決不是一種不可逾越的極限，而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民主制底意義就是平等。很明顯的，如果把平等正確瞭解爲消滅階級，則無產階級之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口號，就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一待社會全體成員對於佔有生產資料的平等實現以後，就是說，一待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立刻發生要更進一步的問題，要從表面上的平等進到實際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一原則的問題。至於人類究竟會經過怎樣的階段，究竟用怎樣的實際方法去達到這個最高的目的——這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的。可是，必須認識，資產階級通常把社會主義想像爲一種靈死，滯滯，永遠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無限虛偽的，其實，只有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在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會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辭棄的，有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是一種國家形態。於是，它如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對人們所施行的有組織，有系統的壓力。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而這點又與下述一點有連帶關係：民主制在共產主義某個階段上，第一就把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階段——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並使其有可能去打碎，粉碎，根本剷除資產階級的——那怕就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機關，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終究還是國家的機器，即是由武裝的工人群眾——過渡到全衆人民實行參加的民權——所構成的國家機器。

這裡就是「數變爲質」：這樣高度的民主制是以越出資產階級社會底範圍，即以開始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這個社會爲連帶條件的。如果真正一切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本身又造成使真正「一切人」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前提。屬於這種前提

的，就是有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實現了的人人職守情形，其次就是千百萬工人被那些已經社會化的巨大的複雜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事業等等等所「訓練和紀律化」。

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就完全有可能來立刻，在二十四小時內，達到實行推翻資本家和官吏，而用武裝的工人，用無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統計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統計的問題，與科學素養的工程師和農藝家等人員的問題混為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在資本家管制下工作，明天他們就會在武裝工人管制下更好地工作的。）

統計和監督就是爲了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安排好，使它能正確地作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地加」底職員和工人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他們正確遵守工作標準，同等工作，並同等領取報酬。對於這件事務的統計和監督，已由資本主義弄成簡單已經，弄成爲一種非常簡單的，連任何一個職員的人都應勝任的視察和登記手續，計算加減乘除和發給相當收條的手續（當國家底主要部分的職能，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幹這種統計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復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爲簡單的管理職能了」）。

當大多數人民都自動和到處實行這種統計，實行這種對於資本家（此時已變成了服務人員的資本家）以及對於那些保留着資本主義習氣的知識分子先生們的監督時，於是這種監督就成爲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了，那時就會無法逃避這種監督，就會「無法可逃」了。

全社會都將成爲一個管理處，成爲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所推行於全社會的這種「工廠」紀律，絕對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而只是爲要澈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卑鄙醜惡現象，

並爲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級而已。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至少是絕大部分成員自己已經學會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握在自己手中，已經辦好了。對於極少數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那些想保留資本主義感覺的先生們的監督，對於那些深爲資本主義所敗壞了的工人們的監督時，於是任何管理的需要就會根本開始消失下去。民主制愈完備，則它披及贅物的時候便愈逼近。由武裝工人所組成的「國家」——即——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民主，則任何國家也就開始消亡得愈迅速。

因爲當大家都已學會管理並且實際上已在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實行監督那些寄生蟲、老爺、騙子以及諸如此類「資本主義傳統底保存者」的時候，迴避這種全民統計和全民監督的舉動就必然會變成極困難極罕見的例外，而且定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處罰（因爲武裝工人是實事求是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來和他們開玩笑的），於是遵守人類一切公共生活底簡單基本規則的必要性很快就會成爲習慣了。

到那時候，就會門戶洞開，可以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級進到它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會完全消亡下去了。

寫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兩日間。

論 國 家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一日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

同志們！依照貴校所定而通知於我的那個計劃，今天我們談話底題目是國家問題。我不知道你們對於這個問題已有何種程度的認識。據我所知，彷彿你們的講習班剛才開課，所以你們是初次來有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雖然如此，那末我談論這個困難問題的第一次講演中，也許會不能談得充分明瞭，不能夠得見使許多聽講者完全瞭解。若果如此，那我就請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因為國家問題是一個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並且可以說是被資產階級的學者、著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不過的問題。所以對於主要問題在一個簡短談話中便可把這個問題完全弄清楚。你們聽了關於本問題的第一次講演後，應該把自己所不懂或不明白的地方記下來，再三再四反覆加以研究，往後從看書以及聽講和談話中間繼續闡明這些尚未瞭解的地方。我希望我們還能再作一次會談，那時我們就能對一切補充提出的問題交換意見，並檢查一下，究竟還有那些最不明白的地方。同時，我還希望你們花費些時間，至少要把馬恩的主要著作讀幾遍，以補充我們的談話和講演。我想，你們在圖書目錄以及貴校圖書館裏所有供蘇維埃和黨校學生參考的教材中，一定能找到這些主要著作，不過也許有人起初又會因為遇到敘述上的困難而感覺害怕，所以我又要預告你們不要因此懊喪，初次閱讀時不甚明瞭的地方，下次再讀的時候，或是後來稍微從別一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可明白的，因為——我再重說一遍——這是個極其複雜而為資產階級的學者 and 著作家弄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所以每個想切實思想和獨立領會這個問題的人，都必須再三加以研究，更加以探討，從各方面加以思考，以求獲得一個明白透澈

的瞭解。它們反覆探討這個問題的機會很多，因為這是關係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問題，所以不僅在我們現今所處的這樣一個洶湧的革命時期，就是在最平靜的時期，也能在任何一份報紙涉及任何一個經濟或政治問題的材料中間碰到國家究竟是什麼？國家底實質怎樣，國家的意義怎樣，我們這個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怎樣等等的問題，——你們每天都會因爲某種緣由而反覆遇到這個問題。而最主要的，就是你們要從閱讀書報以及聽關於國家問題的談話和講演中學會獨立觀察這個問題，因爲你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在每個很小的問題上，在非常出乎意料的情況中，在與人談話以及同敵人爭論的時候，都會時常碰到這個問題的。你們只有學會了獨立判斷這個問題的時候，才可以認爲自己的信念已經充分堅固，並且無論在什麼人面前，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充分順利地堅持這種信念。

作了這幾點小小的說明之後，我就要講到本題，即講到什麼是國家，國家究竟是怎樣產生出來，以及爲完全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工人階級政黨，即共產黨對於國家的態度基本上應當是怎樣的問題。

我已經說過，未必還可以找到第二個問題有如國家問題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律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家有意無意地混亂得這樣糊塗不堪。直到現在，往往還有人把這個問題同宗教問題混在一起，不僅宗教學說底代表人物（他們如此作法，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那些自認爲不受宗教迷信所拘束的人，也往往把關於國家的專門問題同宗教問題混爲一談，並企圖樹立一種學說，——且往往是異常複雜，加上一套哲學思想理由和論據的學說，——說國家是一種天意的東西，是一種超乎自然的東西，說它是人類向來賴以生存的一種力量，是將某種並出於人類本身，而是來自外界的東西賦予人們或可能賦予人們的一種力量，說它是上天降賜的力量。必須指出，這個學說同剝削階級即地主資本家底利益有極其密切的聯系，無微不至地勤勞於他們的利益，深深浸透了資產階級代表

先生對所下的一口習慣，一切制和全部科學，所以你們隨時隨地都可遇見這一學說。這件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某些帶着憤慨神態不認爲他受宗教迷信束縛，並且深信自己能用清國頭向着國家的人所地的話也不是例外。這明明顯之所以被人弄到如此混亂複雜的地步，是因爲它比其他一切問題更加複雜到統治階級利益（在這一點上，它僅次於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人們把關於國家的學說用去辯護社會上的特權，辯護現存的制和制度，辯護現存的資本主義，——正因爲如此，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對待人們表示着偏頗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希望那些具有科學精神自謂的人給你們拿出純粹科學的見解，那就太奢侈了。當你們已經充分認識，充分領會國家問題的時候，你們在關於國家的問題上，在關於國家的學說上，在關於國家的理論上，就始終都能看見各個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始終都能看見在各種國家觀點的相互鬥爭中，在對於國家作用和意義的估計上反映出來或由其表現的這個鬥爭。

爲要用最科學的態度來觀察這個問題，至少也必須把國家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和怎樣發展的經過情形，作一概括的考察。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最可靠的方法，爲真正獲得正確看待這個問題的榜能而不致迷失於許許多多細枝末節或各種各色爭執意見中所必需的方法，爲用科學眼光看待這個問題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繫，而要對於每一個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並根據它的這種發展情形去觀察究竟這個現象現在成了什麼。

我希望你們在研究國家問題的時候看看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起源一書。這是現代社會主義底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信任的，其中每一句話都不是憑空說出，而是根據浩繁的歷史和政治材料寫成的。當然，這部著作不是所有各部分都敘述得一樣淺近易懂；其中有幾部分，是預計到讀者已具有相當歷史和經濟知識的。可是我又要說：如果你們讀這部著作時不能立刻全

而論，那也不必要。這種情形幾乎是每個人都不必要達到的。可是，當你們以後一旦發生興趣而再回到這研究時，就一定會達到命令不是全部通曉，也能明瞭其中絕大部分的。我所以提及這部著作，是因為它在這方面提供了正確觀察問題的方法。這部著作是從說明國家怎樣產生出來的歷史概論開始講起的。

我要再敘察這箇問題，也線觀察任何一個問題，例如資本主義以及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怎樣產生的問題，社會主義問題，社會主義怎樣出現以及它是從怎樣一些條件中產生出來等問題一樣，——爲要它可實地，確信地觀察每一個這樣的問題，都要從歷史上把它的全部發展過程考察一下。談到本問題的時候，首先就要知道，國家不是從來就存在的。曾經有過一個時代並沒有過什麼國家。國家是在社會分成階級的時候和地方，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出現的時候出現的。

有人對人剝削奴隸的形態，被劃分——奴隸主和奴隸——底最初形態尚未出現以前，還存在有氏族制或稱呼爲亞爾制的（亞爾就是氏族，當時人們是氏族而居的）家庭，這種原始時代的遺跡在很各原始部族或風俗中還表現得十分明顯，不管像拿那一部論述原始文化的著作來看，都可以窺見比較確切的描寫，記載和回憶，說曾有過一個多少與原始共產主義相似的時代，當時社會還沒有劃分爲奴隸主和奴隸。當時還沒有什麼國家，還沒有什麼一貫運用暴力和強迫人民服從暴力的特殊機關。這樣的機關就叫做國家。

在人們還是形成一些不大的氏族居住，處於最低級的發展階段，處於近乎野蠻的狀態的那個原始社會中，在與現代文明人類相距幾千年的那個時代，還沒有過什麼國家存在底徵象。當時有風俗底統治，有酋長所享受的威信，尊敬和權力；當時這種權力往往是歸女子執掌的，——當時女子並不是始於她們現在所處的那種無權的被壓迫的地位，——可是當時絕對沒有什麼特別分化出來管理他人，並爲這種管理底利益和目的而經常一貫地持有一種強制機關，即暴力機關——特殊機關，而大家知道，在

現今時代，這類的暴力機關就是武裝部隊，監獄及其他種種強迫他人服從的力的工具，這些是國家實質的東西。

如果把資產階級學者製造出來的所謂宗教學說，詭譎把戲，哲學體系以及各種各種意見拋開，而去探求問題底根本實質，那我們就會看見，國家歸根到底就是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這種管理機關。當有專門從事管理，並為實行管理所需要一個迫使他人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關，即需要監獄，特殊隊伍及軍隊等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也就有國家出現了。

但是從前有個時候還未曾有什麼國家存在，當時公共的聯繫，社會本身，紀律以及勞動規則所賴以維持的習慣和傳統力量，以及族長或女子所享有的威信或尊敬（當時女子往往不僅與男子處於平等地位，而且往往佔有更高的地位），所以當時也就沒有什麼特殊的人，即專門從事管理的人存在。歷史告訴我們，國家這種強制他人的特殊機關，只有在社會已經劃分為階級，亦即劃分為某一集團能够經常擄取另一集團底勞動果實的時候和地方，在有某一個人剝削着另一個人的地方，才生產出來的。

我們始終都要記着社會在歷史上劃分為階級這一事實，因為這是基本的事實。所有每一國家中所有一切人類社會數千年來發展的經過，都向我們表明出這種發展底一般規律，法則和次序：起初是無階級的社會，即始初的宗法的社會，原始的，沒有什麼貴族存在的社會；然後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主的社會。全部現代文明的歐洲都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奴隸制度在兩千年前佔有完全統治的地位。世界上其餘各洲絕大多數民族，也經歷過這樣的行程。在發展程度最低的民族中，現在也還保存有奴隸制度遺跡，例如在非洲現時還可找到奴隸制度的機構。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是最初一次大規模的階級劃分。前一集團不僅佔有一切生產資料，即土地以及雖然當時還很原始的工具等等，並且還佔有人民。這個集團就叫做奴隸主，而從事勞動並把勞動果實交給他人的那些人則叫做奴

據。

在歷史上，這個社會形態而起的早另一個形態，即農奴制度。在絕大多數國家裏，奴隸制度發展成了農奴制度。此時社會基本上劃分為農奴制的地主和農奴制的農民。人與人的關係形式是改變了。奴隸主把奴隸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看待，法律把這種觀點明文規定起來，把奴隸視為完全受奴隸主佔有的一種物品。農奴仍然處於遭受階級壓迫和依賴地位，但農奴主已經不能把農民看作自己私有的物品，而只能享有農民底勞動並強迫他担任某種勞役了。其實，大家知道，農奴制度，特別是在它支持得最久，表現得最顯著的俄國，是與奴隸制度沒有什麼區別的。

後來，在農奴制的社會內，隨著商業底發展和世界市場底出現，隨着貨幣流通的發展，也就產生了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從商品中間，從商品交換中間，因貨幣權力出現而出現了資本權力。在十八世紀時，更正確些說，從十八世紀末葉起，以及在十九世紀時，全世界都發生了革命。農奴制度在西歐所有一切國家都被排除了。這點在俄國發生得最晚。俄國在一八六一年也發生了變革，結果社會形態變化了，即農奴制度已由資本主義更代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劃分仍然存在，農奴制度底各種遺跡和殘餘仍然存在，但是階級劃分在基本上却具有了另一種形式。

資本佔有者，土地佔有者，工廠佔有者在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人口中，始終只佔極小的少數，但他們將全部國民勞動統統把持在手，因而就使全體勞動者都受其支配，壓迫和剝削；這些勞動者大多數都是無產者，傭工工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全靠出賣自己一變人手，即全靠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生活資料。農民在農奴時代還是彼此分散而遭壓迫的，從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起就有一部分人（大多數）變成無產者，一部分人（少數）變成富裕農民，這些富裕農民自己又漸漸地轉入而變成僱農和資產階級。

這件基本事實，即社會從原始形態的奴隸制度過渡到農奴制度，然後又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事

實，你們始終都應該注意的，因為只有問題起這件基本事實，只有把一切政治學說都安置在這個基本範圍內，才能正確估計這些學說，並認清這些學說或事實，因為人類史上這些悠久時代中的每一時代——奴隸制時代，農奴制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都包括有幾千或幾百年的時間，並且包含有許多許許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種各樣的政治學說，意見和革命，所以爲要認清這一切異常紛繁複雜的情形，特別是與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治家談政治，哲學以及其他種種學說相聯的情形，就必須穩穩地把握住這個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把握住階級政治形式改變的事實，作爲基本領導的綫索，並從這個觀點上去劃明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問題。

你們根據這種基本劃分來觀察國家，就會看出，在社會尚未劃分爲階級以前，正如我在上面所說過的那樣，國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但是由於社會階級劃分現象的發生和鞏固，由於階級社會的產生，於是國家也隨着產生和鞏固起來了。人類歷史上有幾十幾百個國度，都經歷了或經歷着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每一個國度內，雖然發生過極大的歷史變更，雖然發生過許多與這一人類發展過程相聯結，與人類從奴隸制度經過農奴制度而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然後又過渡到現今全世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事實相聯結的政治變遷和革命，但你們總可看見國家出現的事實。國家始終是從社會中間分化出來的一種機關，始終是由一群專門或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是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人們劃分爲被管理者與管理專家，後者兩駕於社會以上，稱呼爲統治者，稱呼爲國家代表人物。這個機關，這一群管理別人的人，就是把持着相當的強迫機關，實力強制機關，不管這種對人施行的暴力是表現於原始的棍棒，還是表現於奴隸制時代所用的更善形式的武器，還是表現於中世紀時代出現的火器，還是表現於現今二十世紀的神奇技術和完全根據現代最新技術所造成的武器，橫直都是一樣。使用暴力的手段是替換代謝了，但是自帶國家出現時起，每個社會中間總有一群人在那裡進行管理，被號施令，實行統治，並且爲了維持政權而將實力強制機關，暴力機關以及與每個時代技術程

度相當的武器把持在手。所以，我們只有觀察到這種共同現象，而問爲什麼在沒有階級的時候，在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時候就沒有國家存在，以及爲什麼從階級出現時起就出現了國家，只有這樣，才可找到一個對於國家實質及其意義問題的確切回答。

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統治的機器。當社會上還沒有階級存在的時候，當人們還在奴隸時代以前，在頗爲平等的原始條件下，在勞動生產率還很低微的條件下從事勞動的時候，當原始人類很難獲得必需生活資料來維持最簡陋原始生活的時候，是未曾有，而且也不能有專門分化出來實行管理並統治社會上其餘一切人的一種特殊集團出現的。只有當最初一種社會階級劃分形式已經出現時，當奴隸制度已經出現時，當某一階級的人已有可能專門從事最簡陋農業勞動而生產出一些剩餘生活資料的時候，當這種剩餘生活資料不是爲維持最貧苦的奴隸生活所絕對必需而由奴隸主爲己有的時候，於是在奴隸主這個階級底地位已經因此鞏固起來的時候並且爲了使它這種地位鞏固起來，就需要有國家出現。

而它果然出現了，這就是奴隸主的國家，即賦予了奴隸主一種權力，賦予了他們管理一切奴隸的可能性。當時的社會和國家要比現代的微小得多，其所擁有的交通機關更薄弱得多。當時還沒有現代的交通工具。當時由狹、江河和海洋所造成的障礙要比現在大得多，所以當時國家是在狹小的得多的地理範圍內形成起來的。技術薄弱的國家機關只能供一個範圍較狹，活動範圍較小的國家之用。然而，當時也有一種把奴隸控制於奴隸地位，把社會上一部分人控制於受另一部分人強制壓迫地位的機關。要強迫社會上佔大多數的一部分人經常替另一部分人勞作，就共有一種經常的強制機關不行。當時級還沒有存在時，也就沒有這種機關存在。當階級已經出現時，於是在這種階級劃分加強和鞏固的時候和地方就有一種特殊的機關即國家產生出來。國家底形式是極不相同的。在奴隸制度時代，在按當時水準算是最先進，最文明和最開化的國家內，例如在完全建立於奴隸制上的古代希臘和

羅馬內，已經有過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當時已經有過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的差別。君主政體是一人獨裁的政權，共和政體則一切政權機關都要經過選舉的；貴族政體是很少一部分人底政權，民主政體是民衆底政權（民主一語是從希臘文「德謨克拉西」一語譯出，意即民衆政權）。這些差異都是在奴隸制度時代產生的。雖然有這些差異，但奴隸制度時代的國家，不論是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貴族共和國或民主共和國，總是以奴隸主的國家。

像們在任何古代歷史課程中聽關於這門功課的講演時，都可聽到當時君主國家和共和國家互相鬥爭的事實，但當時基本的事實却是不把奴隸當人看待，不讓不把他們當作公民看待，並且不把他們當人看待。羅馬法也把奴隸看成一種物品，關於被奴隸制的人，奴隸除人安全外，更不用說保護而人安全的其他法律了。法律只保護強一被認爲完全公認的奴隸。在當時所建立的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總不外乎是奴隸主底君主政體或奴隸主底共和國體。在這些國家中，奴隸主享有一切權利，而奴隸按法律規定却是一種物品，不僅可以對奴隸使用暴力，且無過地殺死，也不算受犯罪的事情。奴隸主的共和政體按其內部結構來說，可以分爲兩種：貴族共和國體和民主共和國體。在貴族共和國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在民主共和國體下參加選舉的是全體，但仍然使奴隸主的全體，是奴隸除外的全體。我們必須注意到這種差異，因爲這正是國家問題，並且很明顯地表示出國家底實質。

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底機器。國家底實質是階級壓迫的機器。這門機器有各不相同的形式。在奴隸制度的國家中，有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雖然管理形式極不相同，但本質總是一樣。雖然管理形式不同，但本質總是一樣。雖然管理形式不同，但本質總是一樣。雖然管理形式不同，但本質總是一樣。他們是人。農奴制度國家內的情形也是如此。

由於剝削形式的變更，奴隸制度的國家底實質是階級壓迫的機器。這是有莫大意義的一件事實。在

奴隸制度社會內，奴隸完全沒有權利，根本不承認奴隸是人；在農奴制度的社會內，農民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制度底基本特徵，就是農民（當時農民佔大多數，城市人口增長得極弱）被束縛在土地上，因此就有農奴制度這一名稱。農民可以在地主給他的一塊土地上替自己工作一部分時日，而用另一部分時日去替地主工作。階級社會底實質仍然保存着；社會仍然是靠階級剝削來支持的。只有地主是擁有全部權利的人，而農民則被認為是沒有權利的人。其實，農民所處的地位與奴隸制度國家內奴隸所處的地位很少區別。但是此時他們這些農民畢竟有了較多的達到解放的機會，因為農奴已不認為是地主底直接私有物了。農奴可以用一部分時間在自己的一塊土地上工作，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歸自己支配，並且農奴制度因商品交換即商業關係有更廣大發展的可能而愈益鬆弛，因此農奴求得解放的範圍也愈益擴大。農奴制的社會始終是比奴隸制的社會複雜些。在農奴制社會裡有很大的工商業發展成份，而這點還在當時就產生出資本主義的關係。在中世紀時代是以農奴制佔主要地位。當時的國家形式也是不一致的，也有過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雖然後者表現得較為薄弱），但始終只有農奴制的地主才算是統治者。農奴制的農民始終是絕對不願意有政治權利的。

無論在奴隸制度或農奴制度下，絕少數人為了維持他們對於絕大多數人的統治，都不得不採取強制手段的。全部歷史都充滿了被壓迫階級經常企圖推翻壓迫的事實。在奴隸制度歷史下，有過延長至幾十年之久的奴隸解放戰爭。順便說說，現在德國共產黨，即德國唯一真正進行鬥爭反對資本主義揮霍的政黨，就是取名為「斯巴達克團」，因為斯巴達克是約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的一位最卓越的英雄。在許多年間，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彷彿萬能的羅馬帝國，經常受到在斯巴達克領導下武裝和集合起來並組織有一支強大軍隊的奴隸大規模起義底震撼和打擊。特提到底，這些奴隸有的慘遭屠殺，有的被擄獲，受到奴隸主方面的酷刑拷打。這種國內戰爭，是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全部歷史中數見不鮮的。我剛才舉出的例子就是奴隸制時代所發生的這樣一次最大的國內戰爭。在整個農

奴制時代，也經常發生過農民起義。例如德國在十七世紀時代，兩個階級，即地主與農奴間的戰爭，擴展到廣大的範圍，而變成爲農民反對地主的國內戰爭。大家知道，在俄國歷史上，也屢次發生過農奴反對農奴主的這種起義。

地主爲了維持自己的統治，爲了保持自己的政權，需要有一種機關來壓制大多數人民。其次支配，迫使他們服從相當的法規，而這法規基本上是爲了一個目的，即維持地主統治農奴的權力。這就是農奴制度的國家，其形式——例如在俄國以及亞洲至今還是農奴制度統治的那些十分落後的國度內——頗不一致，有的是共和政體，有的是君主政體。當國家是君主制的國家時，政權是歸一人掌握；當國家是共和制的國家時，從地主口中選舉出來的人可以多少參加政權，而農奴制社會裏的情形就是如此。農奴制社會中的階級劃分，是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完全依賴於人口極少封建地主。

由於貿易底發展，由於商品交換底發展，結果就分出了一個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資本產生於中世紀末葉，當時世界貿易因發現美洲而有極大規模的發展，貴重金屬數量激增，金銀成了交換工具，貨幣週轉造成了巨量財富集中於一人掌握的可能。金子銀子在全世界上都被承認爲財富了。地主階級底經濟力量衰落下去，而新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底力量發展起來。結果是社會改造成這樣：全體公民好像是一律平等；先前那種奴隸主和奴隸的劃分現象已經消滅；所有的人，不管誰擁有多少資本或是按私有權佔有土地也好，亦無論是一隻手的一隻光蛋也好，都是法律上一律平等。法律對大家都同樣保護，對各人的財產都加以保護，免受只有一隻手，漸漸貧窮破產以至變成無產者的大衆侵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不能詳細分析這個社會。你們將來進行黨綱問題談話時，又會講到這個問題，那時你們會聽到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情形的說明。這個社會拿起自由口號反對過農奴制度，反對過當時農奴法制。但這

種自由只是供私有主享受的自由。所以當農奴法制被廢除的，這正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期發生的事，這在俄國比其他各國發生得較晚，即在一八六一年才發生，於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便代替了農奴制度的國家。把全體人民自由宣佈爲自己的口號，說它代表着全民意志，而否認它是階級性的國家，從此就開展了爲全體人民自由而奮鬥的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現在這門鬥爭已造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並且普及於全世界了。

爲要明瞭已經開始了的反對全世界資本的鬥爭，爲要明瞭資本主義國家底實質，必須記着，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反對農奴制的國家時，是拿着自由口號而進行戰爭的。廢除農奴制度，是表明資本主義國家底代表人物獲得了自由，並且給了他們一種利益，因爲農奴制已受到破壞，農民已可能佔有土地了。至於農民究竟是完全佔有他們用贖買方法所得的土地，這問題部份有是贖買代役和制收取得的土地，那國家對此是不加注意的；國家保護着一切私有財產，因爲共產主義，因爲國家制是使私有財產爲基礎的。農民在斯有一切現代文明國家內，都變成買賣者了。國家在每地都給予了土地，分土地的地方，也保護着私有財產，它在這裏叫農民用贖買辦法，即用金錢贖買辦法給予了地主一種報酬。國家好像宣稱說它定會保護全部私有權，於是就對着實行各種各樣的權利和租稅。國家承認每個商人，工業家和工廠主都有這種私有權。這問題以爲國家是爲民衆的社會，以資本主義爲基礎的社會，以完全控制一切無產工人和勞動農民群衆爲基礎的社會，却宣佈自己是根據自由實行統治的。它反對農奴法制時，宣佈私有財產自由，且特別以國家爲基礎，這並不是階級性的國家這點自要曉。

其實，國家仍然是幫助資本家控制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的。國家機器，以它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佈普選權，並且經過自己的擁護者和吹家，讓者和官，使國家機器，說它並不是階級性的國家。甚至當現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反對舊的鬥爭已經開始的時候，這國家是宣佈着自由的人，說我們的國家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這國家是階級性的國家，這國家却是全民的，民

我已給你們指出了能夠幫助你們瞭解本問題的著作，即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起源一書。在這部著作裡，巧講到，凡是存在有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有資本統治的國家，不管怎樣民主，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總是替資本家控制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一副機器。至於普選權，立憲會議和國會，都不過是一種形式，不過是一種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情底實質。

國家底統治形式是可有各種不同的：資本在有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如此，在有彼一形式的地方表現其勢力的方式是如彼，但實際上政權總是操在資本家掌握的：不管是資格限制或別種限制，不管其民主共和制度，橫直都是一樣，並且這種共和制度愈民主，則資本主義底這種統治也愈加橫蠻，愈加公然無恥。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同時也沒有那一個國家內的資本權力，少數百萬富翁對於全社會的統治權力，如在美國表現得這樣橫蠻，這樣賄賂公行（凡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後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這點）。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着全社會，所以無論什麼民主共和制度，無論什麼選舉制度，都是不會改變事情實質的。

民主共和國和普選制，同農奴制比較起來，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為它們使無產階級有可能得到它現在所有的這種統一和團結，組織爲現在同資本進行有系統鬥爭的整齊而有紀律的隊伍。農奴連稍微近似的點的東西也沒有，奴隸更不必說了。我們知道，奴隸舉行過起義，進行過暴動，開始過國內戰爭，但他們始終沒能造成一個自覺的大多數，沒能造成一種領導鬥爭的黨，沒能清楚瞭解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他們甚至在歷史上最革命的時候，也始終是信任憑統治階級操弄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度，國會和普選制，——所有這一切，從全世界社會發展方面來看，都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人類是向資本主義進展了，也只有資本主義，由於有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壓迫無產者階級有可能來認識自己的地位，並造成全世界的工人運動，這種運動在全世界上包括有千百萬工人的政黨，即自覺地領導着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黨。沒有國會制度，沒有選舉制度，則工人階級社會不能有这样的發展。正因此

爲如此，所以這一切都是廣大群眾所十分重視的。正因爲如此，所以要在這方面實行一個轉變也就彷彿是件很難辦到的事情。不僅那些有意作偽的學者及牧師濫證和辯護着「種資產階級謊語」，說什麼自由國家，發國家負有保護全體人民利益的使命，而且有許多誠心誠意重復陳腐偏見，不能瞭解從資本主義舊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人，也擁護和辯護這種謊語。不少那些直接依賴於資產階級，受資本壓迫或被資本收買的人（替資本服務的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學者、專家和牧師等等），而且有許多只是受着資產階級自由偏見影響的人，都在全世界各處攻擊布爾什維主義，因爲蘇維埃共和國剛剛成立時就辦壞了這種資產階級的謊語，而公開聲明說：你們這你們的國家稱爲自由的國家，實則當私有財產還在的時候，你們的國家縱然是個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也無非是使資產階級領事工的一副機器，並且國家愈自由，這種情形也表現得愈明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美國就是如此。資本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統治得這樣公然無恥，這種殘酷無情，這件事情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像在這兩個國家內表現得這樣鮮明，雖然它們都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國家，不管它們粉飾得怎樣漂亮，不管它們怎樣說什麼勞動民主和全體公民一律平等。其實在瑞士和美國都是資本統治一切，工人每次企圖爭得本身地位稍爲嚴重的改善時，都要立刻碰着國內戰爭的對付。在這兩個國家內，兵士，即常備軍隊人數較少，——在瑞士實行着民督制，每一個瑞士人都有槍放在自己家裏；美國直到最近時期還沒有常備軍，——因此，當罷工發生時，資產階級就武裝起來，雇用兵士去鎮壓罷工，並且無論什麼地方鎮壓工人運動，都不如瑞士和美國實行得這樣兇惡殘忍；資本底勢力無論在那一個國家的國會裏，都不如在這兩個國家的國會裏表現得這樣厲害。資本底勢力高於一切，交易所高於一切，至於國會和選舉，不過是傀儡和玩具罷了……但是越往下去，工人也就認識得越加清楚，蘇維埃政權底思想也就傳佈得愈加廣闊，尤其是在我們剛才經歷了的這次流血鬥爭以後。工人階級日益明白認識到，它必須向資本家作無情鬥爭。

不管共和國應用什麼形式組織起來，就使它比封建的社會制度，在如果它不是階級的，如果它那裡保存有土地和工廠私有制，而私有資本和社會黨徒們，保領又封建的地位，換句話說，如果它那裏不實現我們黨綱和蘇維埃憲法所宣佈的專政，那末這個國家就只供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一副機器。我們要把這副機器拿到應該無謂資本協力的程度，使它不供。我們要把地產所有一切說什麼國家是普遍平等的陳腐偏見，因為這是一種騙局：當剝削制度存在的時候，是不會有什麼平等的。地主不會與工人平等，飢寒交迫者不會與飽食暖衣者平等。共產黨級別是為國家而受到迷信崇拜的這副機器，把硬說國家是全民政體而受到信任的這種陳腐偏見打破，這是最重要階級的說話。我們已經從資本家那裡把這副機器奪來了，奪歸我們自己了。我們要用這副機器或棍棒去消滅一切剝削。只有到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實行剝削的可能，世也不會有什麼地主佔有人和工廠佔有人，再也不會有一部分人飽食有餘而另一部分人忍飢受餓的情形時候，共產黨才不會有發生這種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時候，我們才會把這副機器破爛掉。到時候我們才會有什麼階級，我們才會有什麼剝削了。這就是我們共產黨底觀點。我希望我們在以後的會議中大家會回到這觀點，我們不取一次地講到這個問題。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摘錄）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特徵，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為下列五個基本要點：

(一)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那些比較現成形式已經存在時間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是在公開革命發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並成熟了；而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現成形式尚不存在或幾乎尚不存在時間開始發生的。

(二) 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並使選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來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三) 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却只是無產階級革命開始，而政權則被利用為改造舊經濟並組織新經濟的槓桿。

(四) 資產階級革命只限於用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去執家政權，所以它無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把所有一切種種剝削者集團都從政權高峯上推倒下去，並使全體勞動者被剝削者群眾來領導——無產者階級——去執家政權，而且它必須打破舊國家機器而代新的代替之。

(五) 資產階級革命，不論在若干長久時期內把千百萬勞動者被剝削者群眾來團結在資產階級周圍

，這正因為這些群眾是勞動者被剝削者群眾；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它想要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建成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它就能够而且應當使這些勞動者被剝削者群眾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聯盟，這正因為他們都是勞動者被剝削者群眾。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列寧說：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內部，就已有新經濟組織逐漸形成起來，而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改變着封建社會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掃除、摒除、破壞舊社會所有一切羈絆。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一完成這個任務，它就已完成它所應當做的一切，它加強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完全另外一種情況中。由於歷史進程轉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落後，則它由舊經濟本主義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係也就越困難。這裡除破壞任務而外，更加上一種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任務。」（見「列寧全集」，卷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繼續說：

「如果俄國革命那經過一九〇五年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不是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就已創立了蘇維埃，那他們在十月間就會無論如何也不能奪得政權了，因為在當時，成功只是依靠於那包括千百萬群眾運動已有現成的組織形式為轉移。蘇維埃就成了這個現成形式，而因此我們在政治方面就能預期我們後來所遇着的那些燦爛的成功和全盤的凱旋進展，因為新政體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只須頒布幾道法令就把蘇維埃政權從它在革命最初幾月間的胚胎狀態中變為在俄羅國國內與法定的形式——變為俄羅蘇維埃共和國。」（見同上，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邊際」兩個極困難的任務，而解決這兩個任務的方法，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像我們革命在最初幾個月間所經過的那種凱旋進展的。」（見同上，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內部組織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同，正是在於：當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已有資本主義關係現成形式，而像維埃政權——無產階級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那些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資本主義這些最發展的形式在實質上也只包括着一小部分工業上層，却絕對對很少涉及農業。組織統計，監督各最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為一整個巨大機器，變為使幾萬萬人都按照一個計劃而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放在我們肩上的宏偉組織任務。據現時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無論如何都不許用高叫「烏拉」來解決，如我們從前得以解決國內戰爭任務那樣。」（見同上，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極大困難……就是國際問題。如果我們很容易就打破了克倫斯基匪賊，如果我們很容易就在本國創立了政權，如果我們迄未費力就得到關於土地社會化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很容易就得到了所有這一切，那就只是因為當時條件造成的條件，曾在一個短時間內給我們播開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是具有全部資本勢力的，是具有高度組織的軍事技術的——而這個軍事技術乃是國際資本底力量和最實基礎，——它是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處的，這正是由於它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由它所代表的那個資本主義階級底經濟利益，——其所以不能，是由於商業聯系，由於國際財政關係。在這裡，衝突是必不可免的。這裡就有俄國革命面前的最大困難，就有它所應解決的最大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引起國際革命。」（見同上，第三一七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思想，就是如此。

沒有強力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是否可以實現這種根本改造資產階級舊制度的事業呢？

當然是不可以有的。如其以爲可用和平方法，去那幾種社會階級，那新階級就是其目的。實現這樣的革命，——那就是神經錯亂的喪失人類智識的，或如祖魯爾公開發表其階級革命。這個原理之所以更應用，直鄭重指出，尤其是因爲在現時，無階級革命，暫且說只在一國以內獲得勝利，而這個國家是與那些在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裡的資產階級。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能非有強力革命不可，而且，這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一、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隸。——（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說：「首先讓大多數居民，在保存着私有制度的情形下，即保存着資本政權和資本壓迫的情形下，去表示贊成共產階級黨吧，——只有在那時，無階級黨才隱影，才應當奪取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二、我們知道：（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首先讓革命無階級黨去推翻資產階級，打破資本專道，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吧，——那時候，已獲勝利的無階級黨就能以政權去剝削者來滿足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迅速取得這些羣衆底同情和承認。」（見同上）

列寧繼續說：

「無階級黨爲要把大多數居民帶到自己方面來，第一，它就應當推翻資產階級而取得國家主權；第二，它就應當粉碎整個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它就一舉而打破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無產者勞動羣衆中的統治、威行以及影響；第三，它就應當用革命手段，以政權去剝削者來實現那些非無產勞動羣衆底經濟需要，以便徹底剝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者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一頁）

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特徵，就是如此。

既是這樣，既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徵又是如何呢？

請看列寧所給的最一般的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吧：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那已獲得勝利的已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以反對那雖已被打敗，但未被消滅、未嘗絕跡、未嘗停止其反抗的資產階級，反對那更加強其反抗的資產階級。」(見同上，第三二二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全民公選」政權、「非階級」政權混爲一談時說道：

「那已奪得政治統治的階級，是在它深知它是獨自奪取政治統治時而奪得這個統治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底內容。只有當一個階級知道，只有它獨自奪取政權，而不加什麼「全民的、全民公選的、全民公舉的」虛構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時，這無產階級專政概念才有意思。」(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這並不是說，一階級底政權，即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和其他階級瓜分這個政權，而且不能和其他階級瓜分這個政權的階級底政權，爲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竟不需要其他階級勞動者被剝削者群眾來幫助，竟不需要與這些群眾結成聯盟。恰巧相反。這個政權，一階級底政權，只有經過無產階級與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首先是與農民勞動群眾間的特別聯盟，才能奠定並貫徹到底。

這個特別聯盟究竟是什麼呢，其內容何在呢？這個與其他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間的聯盟，一般是

否和一階級專政思想相矛盾呢？

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個特式聯盟底內容就在於：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即無產階級黨，即共產黨，這個黨是不和其黨去瓜分領導，而且不能和其他黨去瓜分領導的。

你們由此可見，這裡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者先鋒隊——與那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界等等），或與大多數勞動者間建立的特式階級聯盟（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這是反資本的聯盟，這是以完全推翻資本、完全剷除無產階級反抗及其復辟企圖爲目標的聯盟，這是以最終建立並鞏固社會主義爲目標的聯盟。『無產階級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環境，即猛烈國內戰爭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堅決擁護者與共黨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堅決擁護者與『中立者』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由鬥爭的規定爲中立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都不相同的階級間的聯盟。」（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十一頁）。

加米涅夫在他某一個指示報告中反對這種了無產階級專政時說道：

「專政不是（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

我認爲，在這裏，加米涅夫首先就說着我所著小冊子『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裡的一段話而言，該段原文如下：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指用『老無產階級』這種階級『機巧』——挑選出來——並『合理』地利用於一些此層階級的簡單政府上其機巧。無產階級專政，乃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

本、爲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爲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爲條件。」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爲我認爲它是和列寧所給的上述定義完全相符的。

我斷定：如果這夫這樣絕對肯定地宣稱「專政不是一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乃是和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論毫不相干的。

我斷定：只有那不懂結合思想、不懂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不懂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思想意義的人，才能這樣說。

只有那不懂下述列寧提綱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國家裡還沒有到來時，只有與農民協定（着重點是我所加。——約·斯大林註），才能够挽救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只有那不懂得列寧下述原理的人，才能這樣說，而這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一）就是維持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以便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鎮壓剝削者時說道：

「專政的科學概念，並不是別的，而正是無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條規所拘束的，直接憑藉於強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永遠記著）無所限制的，憑藉於強力而不是憑藉於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任何已獲勝利的政權，都只能是專政。」（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頁和第四三六頁）。

（一）着重點是我所加。

——約·斯大林註

可是，專政固然非有強力不可，但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強力。列寧說：

「專政固然非有強力不可，但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強力，它並且是比以前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僅只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強力，而且甚至於不是以強力爲主要點。這個革命強力底經濟基礎，它能生存並達到成功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著並實現着那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裡。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裡。」（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至三三六頁）。……「它（即專政。——約·斯大林註）那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群眾底先進部隊，這先進部隊底唯一領導者，即共產黨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它的目的，就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消滅那種把社會劃分爲階級的現象，使社會全體組成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人剝削人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並不是一下子就可實現的，而是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這既因爲改組生產是一件困難事情，又因爲根本改變生活一切部門是需要時間的，再則因爲只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克服那種習慣於按小資產階級方式經營和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巨大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就說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見同上，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特徵，就是如此。

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三個基本方面：

（一）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來保衛國家，來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者間的聯系，來保證世界各國革命底發展和勝利。

（二）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勞動者被剝削者群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來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來吸收這些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來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群衆實行國家領導。

（三）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來保證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

社會。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所有這三方面底合一。無論其中那一方面都不能提出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特徵，反轉來說，只要缺少其中某一方面，就足以使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復成爲專政。因此，無論除去這三方面中那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危險。只有把所有這三方面都總共拿來，才能給我們以完備而週到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其各個時期、各種特別形式、各種不同工作方法的。在國內戰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強力方面。可是，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期沒有進行任何建設工作。如果不進行建設工作，那就沒有可能進行國內戰爭。反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別表現得明顯的，却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者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制等等。可是，從這裏同樣也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期，專政底強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現時，在建設時期中，鎮壓機關、軍隊以及其他組織，也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是同樣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專政就沒有可能進行有若干保證的建設工作。不要忘記，革命暫且還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則也就會有武裝干涉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的一切結果。

論人民民主專政
學習參攷材料

每本人民幣二百元